**nation (state)/国(Guó)**

|  |  |  |
| --- | --- | --- |
| European Perspective | Matthias Middell | 27 May 2022 |

在我们的关键词的英文和法文版本之间就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已经表明，我们很难为整个欧洲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解，也很难确定同样地、同质的中国人的理解，与这个在欧洲和世界思想史上引起众多争议的术语进行对比。

关于 "民族"，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长久以来盛行的观点是，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以久远地追溯到现代之前。民族源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表达，它是稠密的亲切关系，是与其它群体的相应分界线，也是基于此的共同文化和历史。这个版本对民族的理解，在历史上将民族构建的起源，置于领土化进程（the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和现代国家地位（statehood）的形成之前。通常，它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语言相关联，当时的学生在欧洲的大学里，依照民族的划分进行注册和组织。

这大概在1983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格（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的三本重要的作品出现了，他们都按照同样的思路进行论证：对这些作者来说，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发明的（霍布斯鲍姆和兰格），因此，（国家）必须主要被视为一种构建而不是共同体构建之前的真正现实（盖尔纳）。那么，在这个版本中，国家是相对持续地出现的，或者说只是被发明出来的，尽管提及 "发明 "，完全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是无效的，而且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现实。在这一版本中，领土化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早在民族的发明之前就已开始，民族的建构是对全球联系和竞争造就的这些过程的危机之反应。

因此，民族和领土化之间的联系是重中之重，但恰恰并非毫不含混；对它的判断相当不同，这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理解有所影响。通过领土化，我们理解了现代国家行政结构的形成过程（这并不完全基于亲切关系），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明确划定的边界的形成（在当代地图上，愈发地被视为一条线），它取代了（原先）定居地区之间的大型过渡区（边疆）。这种借助明确的线性方式，即毫不含混的划界来划分领土的做法，其前提条件是澄清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管辖权领域中相重叠的法律关系，并同时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在15至18世纪的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和批认它的封建法律权威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但在一个领土的框架内达成广泛的一致性，这一过程即使到18世纪末还远未完成，正如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2016）在他对这一过程的总结中所展示的那样，即使是法国也未完成，而它是在这方面最先进的社会之一。然而，这个漫长的、时常是暴力的、经常是违法的过程，遵循了同质领土的规范性概念，根据斯图尔特·艾尔登（Stuart Elden）（2013）的研究，这一概念自17世纪初就被提出，并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土，有明确的人口，借助领土化的手段组织其内部交流和内部流动，并由一个当局所控制。这种控制扩大了，表现在增加了人口（或人口中的非特权者们）向国家所缴纳的税收负担，以进一步推进领土化，减少内部的暴力和非法行为，并保护其来对抗外敌。这种国家也被称为领土国家或军事-财政国家。在法律上，它一般是一个帝国（规模或大或小），其特点是由建立在神权合法性上的王朝统治，只允许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特权者）有限地参与（政治）。

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概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主权在1789年取代了王朝的合法性。人民，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他们，现在由他们干预政府事务，这些人在早期被称为民族，因为第三产业的代表在三级议会（Etats Généraux）中邀请特权产业的代表参加，变成了 "国民议会 "（assemblée nationale）的联合会议，并粗暴地反对国王。

然而，在一开始，这个民族绝没有明确的领土内涵；相反，法兰西共和国将来自（几乎）世界各地的认可成荣誉公民，因为他们为自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在1792-1815年的战争中，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越来越压倒了由自由使徒组成的单一普遍的国家的世界主义理想。

在大多数历史中，1789年的革命，似乎是现代欧洲国家建设的创立时刻，随后被其它地方所模仿。在这种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国家的民主式理解，它将公民身份和国家地位结合在了一起。宪法构成了国家；所有有权按照这种标准参与的人，都属于这个国家。作为对民族的这种民主式理解的替代，文化民族的思想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讲德语的中欧，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并非由宪法创造，而是在统一的国家建立之前很久，就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它基于血缘关系和与土地的联系，正如1871年德意志帝国所发生的那样。在此基础上，民族国家是全球条件下社会自我组织的，唯一的有效单位之观念，在1900年左右得到确立。所有其它的空间化进程都从属于这一观念，社会的自我观察也相应地被组织起来。统计数据被收集起来服务于民族国家，国家图书馆、剧院、歌剧院、博物馆、学院等机构则强化了这样的印象，即民族是所有社会行动的自然构架，民族国家是民族的天然瓶罐（the natural amphora）。这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因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出现了许多学科。这些学科所代表的知识秩序，全然不是对民族或民族国家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结果，而是对其的发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有其它的空间形式都从属于国家：地方和区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出现，所有的外部关系都被概念化为了国家间的关系。而那些完全不符合这一体系的，例如美国的伯恩斯（Bournes）在1916年就被称之为跨国国家。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困在这种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中，让人想起那句名言："唯有将锤子作为工具的人......才会在每个问题中都能看到钉子"。这决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从外部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尝试，和对民主条件的任何渴望，都被理解为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内部的国家构建。当几十年后，在福利、参与和稳定方面仍然没有成功时，这种挫败感通常会导致不同的国家构建概念（从中央主义到联邦制）之间的冲突，但不会导致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本身的怀疑。

然而，这里浮现了几个复杂的问题，这个过于简单、但却极为流行的从 "帝国到民族国家 "的叙述忽略了这些问题。1780年至1830年的革命时期的结果，绝非是形成了所有公民都平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结合：在大都市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民主，但殖民地的居民却被歧视着，无论他们是爱尔兰的居民还是海地的居民。在这个包括大西洋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全球互动的浓缩时刻的结果中（福瑞斯特（Forrest） 2020；斯瓦森达拉姆（Sivasundaram） 2020），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样式，即帝国外延的民族国家（马鲁斯克/米德尔（Maruschke/ Middell） 2019）。这种空间样式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如果不是两个世纪的话），至少证明了自己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恰当的回应形态。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日本，都走向了这条道路，这在欧洲的意识中是基本缺席的。虽然欧洲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被讨论成为了欧洲以外的国家构建模式，但最强大的国家们，事实上已经构建成了帝国国家（芙拉德拉 （Fradera）2018），或者确实是具有帝国外延的民族国家，只是非常缓慢地在进行去殖民化。

最近的历史学（研究）不仅讨论了大都市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讨论了首都/中心与各省之间的关系。不久前，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塞纳（Pierre Serna）将通常被描述为融入民族国家的行为，描述为帝国对省份的过度重塑，这些省份将被剥夺其自治权和文化独特性。这种理念是许多文化自治甚至政治分离的政治运动的基础——从苏格兰到加泰罗尼亚。

随着世界上对帝国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增加，这种对单一制国家的批判态度可能会增强，因为它将自己展现成民族国家，从而掩盖了其存在的历史断层。因此，对于民族国家，我们有着不同的预言。有些人认为它是主权和民主之锚，因为只有在它的框架内，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参与才能得以平衡。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个即将过期的模式，因为随着跨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它正受到来自不同两方的攻击，而且有人批评它对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和特殊身份认同的压制。然而，就目前而言，这种争论还没有定论，因为末日论者尚未成真，我们亦没有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相互封闭的世界中。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它的重要性至少与其它的空间形式相比，将变得严重相对化，比如跨国和跨区域链和网络、城市和地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超国家联盟，以及事实上已成为当今全球治理主要支柱的新区域主义（regionalism）。